

电子商务税收征管运行机制及其优化

李明修¹ 张武军¹ 王妍²

(1.北京科技大学,北京 100083;2.沈阳辉山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辽宁 110121)

内容提要:为适应电子商务迅猛发展的现实需要,优化电子商务税收征管运行机制迫在眉睫,但现有研究深度不足。在此,依据信息不对称理论、最优税制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整合,通过开展多种形式调研,聚焦基层税务机关征管实践,以客观分析现有运行机制存在问题为基础,深入分析其中制约因素。最终发现,优化电子商务税收征管运行机制的关键在于:加快完善相关立法进程、加强管理组织建设、加强技术支持、加强协同治理。研究结论对于完善电子商务税收征管运行机制具有特殊的理论贡献和现实指引价值。

关键词:电子商务 税收征管 运行机制 优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F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544(2020)08-0057-08

一、引言

电子商务新业态、新模式的迅猛发展和大量涌现,既促进了经济发展,也对现有的税收征管提出了挑战。建立于传统的生产、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基础之上的税收征管机制,对于电子商务所具有的虚拟性强、隐匿性高的特性越发难以适应(董蕾、王向东,2019)。由于传统线下企业越来越多地转为线上运营,导致部分实体经济的税源流失。电子商务不受时空限制的特性,也引发了跨境电商的跨国税收征管博弈(梁鲜珍,2017;苏为华等,2020)。虽然我国2019年开始实施《电子商务法》,一定程度上规范了电子商务交易行为,但是针对具体的电子商

务企业适用的税率、纳税申报周期,以及纳税主体与电子商务平台关于税收职责分工等许多关键问题,目前依然认定模糊。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的运行机制,国内各地税务机关仍处于基层探索之中。许多地方仍在沿用老一套工作机制,尚未形成电子商务税收征管运行机制的深入认识,“新问题旧办法”的存在阻碍了税收征管整体效能的发挥。如果不能尽快完善电子商务税收征管运行机制,既会导致国内和国际税源流失,也会影响税务机关提供良好的纳税服务(戴勇平等,2016;洪明剑,2017)。客观分析电子商务税收征管运行机制存在问题、提出对策建议,有助于进一步改善财税环境、优化营商环境,有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助于经济治理体系和治

[收稿日期]2020-05-09

[作者简介]李明修,文法学院,研究方向为法律政策;张武军,文法学院副院长,博士、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知识产权、专利代理和科技创新;王妍,高级会计师,研究方向为法务会计研究、企业内部控制与信息化研究。

理能力现代化。

提出优化电子商务税收征管运行机制的建议,需要寻求合适的研究思路。从国内外电商税收征管理论研究来看,当前研究热点趋于实证分析,但完善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的具体措施非常有限(王凤飞,2019)。这就要求我们尽可能根据基层探索情况,及时归纳总结、提炼概况。通过开展问卷洽谈等调查研究,收集整理基层税务机关的经验做法,收集整理鲜活的观点和主张,聚焦电子商务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为本研究提供了反映电子商务税收征管运行机制的实践分析基础。

为了呈现简单一致的理论框架,本研究借鉴运用了三种理论视角。第一种理论视角是信息不对称理论,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的难点在于信息不对称。税务机关迈向信息对称的过程,将使税负更加公平、道德风险更低、经济发展更加均衡。第二种理论视角是最优税制理论,意图在于税收不阻碍电子商务产业发展。注重税收效率原则,注重保持中性,不干预电商资源的合理配置,促使政府税收达到帕累托最优。第三种理论视角是新公共服务理论,强调税务机关作为电商发展的服务者角色。既要更新完善服务手段,又要获得电商企业的通力合作。通过三种理论的有效结合,既指导了实践调查研究分析,又引导了逻辑思路和理论思考。理论指引下的现实问题分析,以及现实问题的理论概括,构成本文理论结合实践的特色,这对于完善电商税收征管运行机制具有特殊的理论贡献和现实指引价值。

二、国内外研究述评

(一)国外相关研究

电子商务的税收征管存在政策难点。研究发现,以票控税的方法难以在电子商务领域实现,这源于发票很少使用(Nguyen et al.,2012)。相关问卷调查显示,网购消费者很少向商家索要发票,商家也不会主动给消费者开具销售发票。数字产品本身具有销售隐匿性、交易资料难以获得性、实体机

构的欠缺性等特点,导致征税难度加大,偷税漏税较为容易(Kortenaer & Spanjersberg,2013)。同时,政策难点还体现为税收征管要避免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尊重纳税人的隐私情况,保持国际间经济的平稳运行。

电子商务税收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表现微弱。美国学者分析了电子商务经营者对税收的敏感性问题,认为总体敏感程度正在下降(Austan Goolsbee,2000)。其中一项税收敏感性模型分析表明,消费者对电子商务进行征税并不非常敏感,如果销售税率提高1%,则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将会下降千分之四。综合来说,电子商务税收给电子商务未来发展不会造成严重的影响,即使有影响也是微乎其微。

电子商务的税收优惠政策具有合理性。研究认为,政府如果对电子商务有过多限制,税收流失会远远超过电子商务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增加额。因此,只有鼓励和扶持电子商务这两条路,才能让国家经济越走越远(Basu S.,2010)。政府不应该拿电子商务作为缓解财政赤字的挡箭牌,仅是为了增加税收而对电子商务实施更多的税收征管(Sarah Thoma,2012)。通过税收优惠政策,电子商务能够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的实践经验丰富。美国要早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电子商务进行研究,1996年发表《全球电子商务选择性的税收政策》研究报告,讨论互联网贸易的税收政策问题。《欧盟电子商务增值税指令》于2002年通过,该指令对数字产品和电子服务等行为做出了范围界定,明确了征税对象即数字产品交易,征收税种是增值税,税收制度要不断与时俱进。注重效率与公平是加拿大对电子商务税收征管所秉持的原则,在不妨碍电子商务发展的同时,在交易性质和功能大致趋同的情况下,对电商纳税人和实体经济纳税人所采取的税收征管要一致,不允许因交易形态而区别对待。属地管辖权是划分电子商务税款权属问题的标尺。印度规定,

如果一家印度公司在印度境外使用互联网向美国的公司支付货款,就认定为此款项是来自于印度的特许权使用费,并在印度征收预提税。新加坡政府公布了一项有关电子商务的税收政策,如果一家企业在本国境内设立网址和分支机构,其经营所得即为本国所得。英国强调电子商务方面的税收征管条例务必短小精悍、简洁明了,税收法规不能造成双重税负或非故意不纳税。

(二)国内相关研究

完善电子商务的税收征管制度。为了应对挑战,急需构建电子商务税收管理现代化体系(任国哲,2018)。C2C型电子商务的税收征管需要税务机关与平台的协同治理(张玉凯,2018)。通过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对电子商务税收征管模式进行契约式设计,规范电商经营主体的经济行为(王凤飞,2019)。采取电子商务交易平台与电子商务企业税务注册登记及经营检测相结合的方式,对电子商务交易行为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监控(靳万军,2014)。征收增值税的时间点可以是最终消费环节,纳税地点可以根据消费地点确定(谢波峰,2014)。

电子商务的税收征管要注重税负公平。楼继伟2016年在G20央行行长和财政部长会议上指出,保障税收可持续性的关键就是促进税收公平,对于当下兴起的电子商务、数字经济和共享经济等新兴产业,我们更应该保障税收的公平性。国家忽略了对电子商务交易采取严格的税收政策,这就导致国内出现市场经济不公平的现象发生,更对税收制度的可持续性产生了负面影响。蒋震(2013)提出对互联网交易的税收制度设计必须考虑到产业发展的要求,形成统一的电子商务税收政策,避免线上和线下企业税负不均。

电子商务税收的法律法规亟待完善。构建电子商务税收法律体系十分关键(洪明剑,2017;董蕾、王向东,2019)。国家税务总局2016年发布了财关税[2016]18号公告,该公告制定了关于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税收方面的规则。发展改革委、商务部、

人民银行、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工商总局、质检总局联合印发了发改高技[2016]2654号文件,同意将我国17个城市创建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以体制、政策和投资方面作为关键环节。2019年《电子商务法》的正式施行具有重要意义,急需完善细则。

(三)国内外研究评论

现有研究为本文研究电子商务的税收征管运行机制奠定了重要基础。国外电子商务的税收征管理论和经验值得借鉴。国外研究要早于国内,在税收优惠、技术难点和可行性分析等方面研究深入,研究领域广泛,对我国电子商务税收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具有示范引领作用。国内学者从完善征管制度、确定征收环节和注重税负公平等不同角度展开研究,很有参考价值。

对于如何完善电子商务的税收征管运行机制,现有研究深入程度略显不足。首先是仅在宏观层面进行探讨,缺少运行机制的细致入微分析,缺少深入基层税收征管机关的调查研究。其次是仅在全国层面进行探讨,很少针对某一具体地区的实际分析。最后是研究方法局限于理论探讨和一般经验总结,缺乏实证分析。为了弥补研究缺口,增强实践性和可操作性,本文立足基层税务机关征管实践,提出优化电商税收征管运行机制的建议。

三、电子商务税收征管运行机制存在的问题

(一)管辖权及课税对象认定困难

1. 常设机构难以确立和收入来源地难以确认。就某一省而言,常设机构难以确立体现在:电子商务具体的经营地点难以确定,专门用于从事商业活动的固定场所更无法找到。辽宁省的收入来源地难以确认体现在:来源地的确定会随着收入类型的变化而变化,收入来源地和实际的地理位置之间关系淡化,无法确定是否在该区域范围内。各个国家和地区对于收入来源地的判断经常出现分歧,造成税

收管辖权确认困境。

2.课税对象很难用物与行为来认定。作为一种征税目的物,可以根据课税对象来划分征税的依据,是区分不同税种的主要标志。在传统的商务交易模式中,课税对象主要包括:行为、物和财产。而以虚拟化为主要特征的电子商务,支付手段非常隐匿,且拥有无纸化的特征,很难用物与行为来认定电子商务中以数字化方式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方式。快速而隐蔽的交易行为和交易物就会使得课税对象在电子商务中变得认定困难。

(二)电子商务税收征管专项管理不力

以辽宁为例,目前电子商务企业税收工作的主体是各基层分局第一税务所的工作人员以及税收专管员。然而,电子商务企业纳税环节错综复杂,从税务登记、纳税申报再到税款缴纳等纳税流程,都需经过系统及各个税务机关人员之手。一项办税事宜很有可能会经过十几人之手,其中有一项监管不力、工作疏漏,就会造成申报不实,甚至税款的流失。一旦真正出了问题,就只能依靠后期溯源查找原因,及时补救。有些电商企业会通过各种不同的公司名称与买家进行交易,在交易金额不变的情况下,分摊到每个不同交易主体的合同上,就会达到国家减免税标准,这样会造成国家税款的流失。

(三)税务稽查无法信息共享

面临电子商务海量的交易信息,征税机关往往信息化手段滞后,难以及时追踪确认每一笔交易。能否有效验证每笔交易的真伪,是否是虚假刷单行为,征税机关也面临很大挑战。在信息严重不对称条件下,征税机关能否获得电商企业的真实数据存在较大疑问,税务稽查存在信息共享难题。实际工作中,税务征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只能通过金三系统中企业的自行申报数据对其进行监督,没有与外部网络尤其是电商平台进行信息联网。这就造成了有些电商企业的实际营业额和金三系统申报额不对称的局面,导致税务稽查的约束力不足。

(四)数字产品征税属性不规范

在网络直播流行的今天,数字产品层出不穷,基层税务机关对网络主播打赏、微信文章打赏、网络软件销售等行为的资金性质难以准确定义,更难以判断这笔资金是否在征税范围之内。首先,给“网红”刷礼物等资金打赏行为属性难以界定。这种打赏行为究竟属于赠与还是属于劳动报酬,在税收征管方面存在本质上区别。前者无需缴纳税费,因为我国并没有“赠与税”,国内许多地区也尚未出台相关税收政策;而后者则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同时,很多网络直播平台等第三方平台并没有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没有对应交税费进行代扣代缴。其次,网络主播、经纪公司和网络直播平台对于个人所得税的算法并不统一。网络主播和经济公司之间如果是雇佣关系,则按照工资薪金计算个税,如果是合作关系则计算劳务报酬所得税,这就造成了最后计算出的应纳税所得额相差很大。最后,难以判断交易资金性质的现象也存在于计算机软件销售领域。对于计算机软件销售,难以判断这是有形产品交易,还是获利方的无形产品(或服务)的提供行为,亦或是特许权的转让。

四、存在问题的深层原因分析

(一)相应法律依据及规章制度尚不完备

我国虽已实施《电子商务法》,但是法律中针对纳税义务人税率、征收率、计税依据、税收管辖权以及课税对象的认定还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同时,旧税法与电子商务交易模式不相适应,存在着漏洞和国际避税空间。如果企业没有进行税务登记,税务机关就无法进行资金监管和纳税调查,税收管辖权认定就会出现問題。由于缺乏电子商务的交易认定实施细则,在交易匿名支付和纸质合同缺乏情况下,税务检查部门针对具体的交易金额等交易细节难以认定。一些针对知识产权的交易活动及有偿咨询缺乏实施细则规定,使得税务机关对一些税收违法行爲难以进行定性处理。电子商务交易中的贸易

对象往往会以“数字化资讯”名义在互联网中传送,此项收入被认定为销售所得、劳务报酬亦或是特许使用费的争议尚未解决,这就造成了地方税务监管方面无章可循、执行困难。

(二) 电子商务税收征管专项管理组织不健全

有效进行税收监管的组织尚未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而建立健全。目前税务机关的征管主体主要是各基层机关的第一税务所工作人员和税收管理员,针对电子商务企业税收征管工作,两者没有明确进行职责分工。“新业务旧机构”的情况突出,目前只是按照实体经济下的企业管理方式进行监管。鉴于很多电商平台的企业或个人并未进行税务登记,因而无法分配给专管员进行管理。同时,税务稽查局还不能主动介入电子商务的稽查监管,尚需群众举报作为前提。更重要的是,税务稽查所需的相关法律法规依据不足,制约了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的治理效能。

(三) 电子商务税收征管技术支持不足

电子商务税收征管所需的信息收集、分析、处理、共享平台尚未建立,严重滞后于电子商务的业务发展。地方基层税务机关缺乏具体的信息技术支持,缺乏大数据分析手段,难以实时掌握各个网络交易平台及电商企业的具体交易情况。电子资料具有易被篡改、造假不留痕迹的特点,税务机关缺乏“硬核”技术力量加以监管纠正。特别是,许多企业采用技术手段逃避税务监管,规避纳税义务,税源流失的技术漏洞层出不穷。许多电商企业高薪聘请网络技术人员为本企业进行网络信息系统的设计、改造和维护,妄图通过互联网信息技术来寻找避税漏洞,为本企业打造避税的安全基地。某些企业运用 E-mail、IP 电话和传真等技术手段建立与外界沟通渠道,采用第三方支付、网上银行、信息加密处理和社交软件等避税手段。这些技术手段使得偷逃税款更为隐蔽,加大了税收征管难度。电子商务具有全球性和隐匿性的特征,国际间没有税务联合的机制,才导致许多企业在他国选择注册经营地址,规

避税收监管。

(四) 各方主体责任亟待强化

纳税主体的纳税义务亟待强化。《电子商务法》明确了纳税主体、纳税义务及征收手段。该法的出台规范了电商市场,然而很多细则尚需研究制定,以进一步规范电子商务从业者纳税主体作用。电商平台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亟待强化。如果电子商务交易中,一些违法行为没有受到平台的监控和制裁,那么广大消费者的权益就无法得到保护。电商运营平台应当向税务部门报送平台内经营者身份信息和与纳税有关的信息,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避免征税机关对新兴产业的税收征管“一刀切”。如果对电子商务采取高税率的征收方式,无疑会给互联网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阻碍。

五、优化电子商务税收征管运行机制的对策建议

(一) 加快完善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的相关法律立法进程

1. 完善数字产品征税法律规定。建议尽快出台新的税种,以适应电子商务产业蓬勃发展的现实需要,兼顾社会公平,助力实体经济的发展。应以电子商务交易金额为计税依据,将其所售卖的商品和服务纳入征税范围。以卖方为纳税义务人,纳税环节是资金流通环节,以商品销售地为纳税地点。要严格监控资金流通环节。从操作简便性出发,加强对电商交易中的资金流监控,减少信心监控时间成本。法律法规中可以明确规定,电子商务交易系统中必须安装税款扣缴软件,这样有利于简化税收征管程序,也有利于保护电子商务交易主体的隐私,防止第三方机构监控和商业机密泄露等问题。

2. 优化税务登记制度。首先,要减少税务登记成本。采取“多证合一”做法,把电子商务税收登记在“三证合一”中加以运用,实现“多上网路,少跑马路”。建立针对电子商务企业的税务登记系统,简化企业信息登记流程,保证多项信息的准确性。实现

信息互联互通,推动工商、海关、信息、银行、第三方交易平台、电子支付平台、物流平台等进行信息连通。再次,可以采取税务登记号码制度。电子商务企业要在首页展示本企业的税务登记号码,合法开展交易活动,接受税务监管部门、第三方交易平台和社会公众共同监督。最后,可以分类实施电子税务登记制度。根据经营模式,分为商对商、商对客、客对客即 B2B、B2C、C2C,进行分类登记。根据不同规模进行分类管理,可以提高税收征管效率、降低企业税务登记成本、方便纳税企业、提高税务部门服务效率。

(二)加强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的管理组织建设

1.建立健全电子商务专项税收征管机构。将电子商务企业税收政策和管理模式与传统线下企业税收进行区分管理。通过明确专责机构和专责岗位,既方便对纳税人进行释疑解惑,更有利于地方税务机关有效开展税收服务。职责明确有利于第一时间追溯到相关责任人,简化办事流程,提高行政效率。探索建立电子商务税收征管专门机构,进行专业化管理。

2.增强税务部门依法课税意识并加大税收宣传力度。借鉴网络警察模式,加强税务机关的网络稽查工作。培养招收税收事业急需的复合型人才,培养一批既懂税务专业知识、又懂计算机知识的稽查人才队伍。建立专门的电子商务稽查领导工作组,对网上的电子财务数据进行依法稽查,对税源进行跟踪处理。及时将情况多发的典型案例汇编整理,供广大税务干部讨论学习,增强税务部门的依法课税意识,增强税务稽查干部处理复杂案例能力,打击电子商务税收违法行为。自律与他律要双管齐下,地方税务部门要加大税收宣传的力度,让广大电子商务企业从思想上认识到依法纳税的重要性。同时要让电子商务企业充分了解各级政府对于诚信纳税企业所给予的税收优惠政策及金融服务,让电子商务企业在依法诚实纳税的同时,享受诚信所带来的税收政策红利。

3.加强各部门对电子资金流的协作监控力度。税务部门要加强与省内其他金融机构的联系,加强与银行间的合作,协同加强税源监控。税务部门要推动有效使用电子发票工具,交易行为发生时系统会自动开具电子发票,并上报税务系统监控平台。这有利于税务部门及时掌握资金动向,识别电子商务中不明来源收入情况,利于税源监管。要明确规定相关金融机构及电子商务第三方平台的社会责任。要密切关注数字经济间交易往来的资金流向,建立起数字化的资金流动账簿。税务机关通过多方协作,能够更准确掌握电子商务企业资金动向及企业应纳税所得额,推动网络交易平台、纳税义务人收款账户和税收软件之间进行高质量的信息交换。

(三)加强技术支持以实现税收征管信息共享

1.加强内部信息整合。第一,企业电子纳税系统内部信息整合。电子申报可以通过网络计算机或收集等手段向税务机关申报税务信息和财务资料,纳税人不必亲自到税务机关就能完成纳税申报。电子支付是纳税人通过与银行及税务部门签署的三方协议,在银行账号上直接扣缴应纳税款。更进一步,采取技术手段促使电子申报和电子支付无缝衔接、实时共享,减少重复申报和多次核对,实现纳税的透明高效。第二,税务机关内部信息整合。通过税务登记信息的整合共享,有助于纳税违法行为联合惩戒。比较可行的办法是,针对一些偷逃税企业的法人再次在同一行政区域内的其他区税务局注册公司的行为不予支持,在系统中强制要求该法人将欠缴税款弥补之后,方可进行其他企业的税务登记。另外,要促使企业的其他事项信息能够在不同地域实时共享,避免繁琐重复的登记操作。第三,税务机关与工商、海关、银行等相关机构的信息整合。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离不开税务机关与各个机构之间的信息联动,以保证资金流、物流和信息流的统一,促进电子商务税务征管工作向着高效便捷化发展。如果税务机关能够与银行系统进行联网,办理三方协议等事项重复跑路的现象就会大大减少。税务机关

和海关等部门也亟需信息联网,特别是涉及跨境电商和国际物流,减少重复申报和申报差错。

2.加快获取外部涉税信息合法进程。第一,要加强与世界各国税务机关的合作紧密度,对国际互联网贸易政策制定环节,在积极参与的同时,要提出合理建议,不断扩大与国际税务机关之间的交流,取长补短,以期最大限度地打击利用国际政策漏洞造成的偷漏税行为。第二,要尊重国际税收方面的相关管理条例,在维护国家间税收利益平等的同时,加强与国际间的合作,尽力消除税收壁垒,团结一致打击网络国际税收违法行为。第三,要与国外的金融机构保持更加密切的合作,通过共同谋划税收协定,或者明确国外金融机构的相关义务,防止出现网络贸易的海外税收违法行为。我国也要积极参与制定国际网络贸易方面的税收征管规则,及时完整提出合理化建议,加快获取外部涉税信息合法化进程,保障税务机关针对跨国贸易税收违法行为的惩处有法可依。

(四) 加强对电子商务税收征管中利益相关方的协同治理

1.加强对交易平台的协同治理。当前,亟需协同获取电商平台交易资料及其虚拟货币交易情况,并与工商、海关、税务等部门共享,定时按期向税务机关报送财务报表等相关涉税资料。这将方便税务机关及时掌握电商企业经营情况,并针对现实情况及时调节税收政策,以更好助力电商企业发展。目前电子商务的主要支付方式有蚂蚁金服旗下的支付宝、微信转账、金融机构网上转账、网购平台的虚拟货币,但是无法确定每笔交易中的资金流是否用于网购,或者是否用来购买数字产品。因此务必加强对交易平台的有效适时监管,加强买卖双方的实名监管。促使相关交易平台加强自我约束,发挥模范作用,加强经营者的依法纳税意识,促进整个电子商务生态的协调发展。

2.引导大型电商企业发挥引领作用。运用多种激励约束手段到对电子商务企业的税收征管中去,

以促进、引导大型电商企业发挥引领作用。税务机关可以根据电商企业的纳税申报情况将企业分为A、B、C、D等若干等级,给予纳税信用良好A类电商企业政策优惠和优质纳税服务。税务机关也可以与银行等金融企业进行合作,对纳税信用良好的A类电商企业进行奖励,对不诚信纳税、不如实申报的偷漏税电商企业予以惩处。在发票发售方面,税务机关也可以对那些诚实守信、纳税信用良好的A类电商企业进行发票额度提升和发票组数增加,对那些纳税信用等级低的企业限制其开票额度,税控盘也要严加管控。

3.推进异地虚拟交易的协同监管。促进跨地区合作,积极处理异地虚拟交易的涉税问题。税务部门应当构建一体化的管控模式,开发出功能齐全、全国一体的异地虚拟交易监管信息系统和平台,更好地对异地虚拟交易进行实时管控。在无法确认地址的网络纠纷发生时,交易双方不清楚具体归属哪个地区的工商税务部门,可以根据电子商务中商品交易场所归属的服务器所在地,作为一家电商企业的常设机构地点。

六、结语

当前我国电子商务发展方兴未艾,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税收征管问题亟待解决。立足于基层税收征管实践,根据现存问题,提出要优化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的运行机制。并通过实践探索,为积极推进电子商务税收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提供实践依据。完善税收征管运行机制,必须摒弃强硬行政执法色彩,转向刚柔并济的综合税务治理转型,偏重于主动纳税文化的宣导与培育。其次,各地基层税务部门要顺应时代发展,对税务征管系统不断完善、更新。同时加强税务人员的培训力度,帮助其提高专业水平,合理利用科技手段。结合税务部门的信息中心共同研发技术,更新网络稽查水平。最大限度地避免网络交易中偷漏税行为的产生,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财税保障。

参考文献:

- [1] 董蕾,王向东.数字经济下C2C 电子商务课税的挑战与对策[J].税务研究,2019(09):90-94.
- [2] 梁鲜珍.数字经济对税收的影响及其应对措施[J].税收经济研究,2017,22(03):41-44.
- [3] 苏为华,王玉颖,张崇辉.国外跨境电子商务税收冲击的经济效应:基于 TSO-DSGE 模型的研究[J].统计研究,2020,37(01):17-32.
- [4] 戴勇平,徐菊兰,许和平.完善税收风险管理运行机制的对策[J].税务研究,2016(07):67-70.
- [5] 洪明剑.广西电子商务发展税收问题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17(47):25-29.
- [6] 王凤飞.委托代理视角下电子商务税收征管模式的契约式设计[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9,40(04):50-56.
- [7] 任国哲.构建电子商务税收管理现代化体系的思考[J].税务研究,2018(02):114-116.
- [8] 张玉凯.论 C2C 型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的协同治理[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0(02):169-174.
- [9] 靳万军.网店税收秩序规范管理探析[J].税收经济研究,2014,19(01):21-25.
- [10] 谢波峰.对当前我国电子商务税收政策若干问题的看法[J].财贸经济,2014(11):5-12.
- [11] 蒋震.关于电子商务税收政策的几点思考[J].税收经济研究,2013,18(06):35-38.
- [12] Subhajit Basu. Relevance of E-Commerce for Taxation: an Overview[J]. Global Jurist Topics,2011(9):89-91.
- [13] Hang Nguyen,Meredith De Cenzo,Meyer Drucker. E-Commerce and Taxatio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J]. IUP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 Audit Practices, October 1, 2012(8):23-24.
- [14] Austan Goolsbee. Internet Commerce, Tax Sensitivity, and The Generation Gap[J].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Journals, 2000(7):45-65.
- [15] Sarah Thomas. Sales Taxes: Electronic Commerce Growth Presents Challenges: Revenue Losses are Uncertain [J]. Journal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2012(7):65.
- [16] Big Data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itiative. 2014.
- [17] Basu S. To Tax or Not to Tax? That is the Question Overview of Options In Consumption Taxation of E-commerce [J]. Law Technology, 2010(67):102.

【责任编辑 张经纬】

(上接第 47 页)

- [20] 傅勇,张晏.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J].管理世界,2007,(3):4-12+22.
- [21] 黄国平.财政分权、城市化与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失衡的实证分析——以东中西部六省为例[J].宏观经济研究,2013,(7):70-77.
- [22] 余可,温海滢.分税制下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与地区经济增长[J].华东经济管理,2011,25(1):54-58.
- [23] 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2007,(7):36-50.
- [24] 孙克竞.地方政府债务成因的长期动态关系及其疏导——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 VAR/VEC 模型分析[J].经济管理,2015,37(5):1-11.
- [25] 定明捷.多委托代理视角下行政监察的组织困境及其消解[J].行政论坛,2014,21(06):58-62.
- [26] 严仍昱.公民权利保障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构建[J].中州学刊,2013,(7):12-15.
- [27] 李燕.基于民主监督视角的预算透明度问题探析[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7,(12):1-6.
- [28] 王银梅,孟祥菁,饶玲玉.推进预算公开保障纳税人用税监督权[J].税务研究,2015,(5):68-71.
- [29] 黄舒婷,李永久.我国公共预算信息公开的瓶颈与突破——基于深圳公民预算之旅的反思[J].地方财政研究,2010,(5):22-25+30.
- [30] 李文彬,赖琳慧.公众满意度与政绩有关系吗?[J].华东经济管理,2016,30(5):153-159.
- [31] 胡荣,胡康,温莹莹.社会资本、政府绩效与城市居民对政府的信任[J].社会科学研究,2011,25(1):96-117+244.
- [32] 孟天广,杨明.转型期中国县级政府的客观治理绩效与政治信任——从“经济增长合法性”到“公共产品合法性”[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4):122-135.
- [33] 芮国强,宋典.信息公开影响政府信任的实证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2,(11):96-101.
- [34] 于文轩.政府透明度与政治信任:基于 2011 中国城市服务型政府调查的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13,(2):110-115.
- [35] 姜明安.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的相互关系[J].法学杂志,2013,34(06):1-8.
- [36] 郑方辉,卢扬帆.法治政府建设及其绩效评价体系[J].中国行政管理,2014,(6):26-31.
- [37] 曹劲松.网络问政与社会管理实践创新[J].南京社会科学,2011,(4):97-103.
- [38] 后向东.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政府信息公开制度[J].中国行政管理,2018,(5):6-10.

【责任编辑 孟宪民】